

试论苏绣与苏州

——兼对工艺品与产地关系的探讨

全国“四大名绣”之一的苏绣,为什么能流传千余年,经久不衰,而且愈来愈显出其光华,这是因为它有形成和发展的优越条件。除了苏绣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,还与产地苏州有着不可分离的因缘。从苏州对苏绣的影响,可以探索工艺品与产地的辩证关系,研究总结出规律,以利今天的发展。

如果苏绣是亭亭玉立的花枝,富饶的苏州就是它适宜成长的土壤。苏绣在“天、地、材、工”诸方面得天独厚,才得以如此分外妖娆;苏绣花开,也处处散发着苏州乡土的特有芳香。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是苏州促成苏绣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。

一、苏州的悠久历史与苏绣的源远流长

苏绣的源远流长,缘起于苏州的悠久历史。如果当初没有苏州地区的形成和发展,作为装饰艺术的苏绣就如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,不可能产生和得以应用。苏绣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逐步产生的,是在苏州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生活的产物。

从历年来出土文物可知,距今五、六千年前,苏州地区已在形成之中。吴县草鞋山古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,就有草绳、篾席等编织物和我国出土最早的纺织品实物(南京博物院《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》见《苏州文物资料选编》),说明这里的人们已学会编织,有了纺织物,为刺绣提供了底料。在吴县草鞋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,还出土了不少石器、陶器和玉器,部分陶器上刻着精细、复杂的图案,玉器上四面还雕有饕餮纹图案(钟鼈《从江苏原始社会后期考古资料看私有制的产生》见《考古》1976年第3期),说明人们已经发展着艺术思维、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才能,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,发展了精神财富的生产,已喜爱装饰自己。这些,都为苏州刺绣的早期形成打下了基础。

古代吴越一带风俗,人们截短头发,身绘花纹,以避水中蛟龙之害,既是一种原始的图腾,也是装饰艺术的反映。自泰伯、仲雍南来建立了“勾吴”,吴地逐渐繁盛起来。《左传》载:“仲雍嗣之,断发文身,裸以为饰。”而这种刺缕纹身,很可能诱导苏绣的产生。据汉代刘向《说苑》载:“晋文公使叔向聘吴,吴人饰舟以送之,……左百人,右百人,有绣衣而豹裘者,有锦衣而狐裘者。”晋文公在位是公元前636—前628年,这是二千六百年前刺绣在苏州人们生活中已经流行的记载。据传民间“青莲包头藕荷兜”的习俗,系吴王夫差同西施泛舟赏荷,见采荷姑娘伏在木盆里采莲,头顶荷叶,腰环荷花,十分好看,回宫后吴王命侍女用彩绸照此仿制,并以刺绣的莲荷图案装饰在包头巾和腰兜上,西施穿戴在身上更显秀媚可爱。于是这种“青莲包头”和“藕荷腰兜”成了苏州农村妇女最常用的刺绣服饰。

由上所述,二千年前刺绣在苏州出现并不是偶然的。这里的物质条件、艺术构思、地方风俗、服饰爱好等,都促成苏绣的诞生。苏绣与产地的社会进程相一致,在苏州形成的过程中诞生了苏州刺绣。

二、苏州的盛而不衰与苏绣的兴盛发展

古城苏州在公元前513—前496年就已建立，从此“威行海外三千里，霸占江南第一都”。苏州成了当时江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《吴县志》载：“吴为大邑，历代台府咸驻节于此。”正因为如此，给苏州带来了繁荣兴盛，促进了苏州生产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，这对苏绣在人们富裕的生活中被得到应用和得以茁壮成长，无异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王嘉《拾遗记》载：“吴主赵夫人，丞相达之妹。……权使写九州方岳之势。夫人曰：‘丹青之色，甚易歇灭，不可久宝，妾能刺绣，作列国方帛之上，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’。既成，乃进于吴主，时人谓之‘针绝’。”三国纷争时，这里相对的比较安定，因此有“针绝”的出现，已伏苏绣昌盛之机。自宋代以来，苏州渐获“天堂”之称，朝廷也在苏州设织造局，集中机户、绣工进行织绣专业生产。苏绣随着贡品进入皇宫，受到上层重视。建于五代北宋期间的虎丘塔、瑞光塔中，都有出土当年的刺绣经袱。虎丘塔出土的经帙，皆刺绣花卉，针法不甚细致，却古朴大方，并有绣“舍”字的（《苏州市文管会《虎丘云岩寺发现文物简报》，见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7年11期）。苏州昇平，兴建佛塔，也给我们留下了反映当时面貌的刺绣。明清时期苏州的兴盛，人们生活的富庶，对衣食住行的享受也愈加讲究，刺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民间刺绣日用品特别多，如刺绣的被面、枕套、帐沿、桌披、镜袱、香袋、纸插、首饰盒、钱袋、水壶罩、发缘袋、伞盖、荷包、小挂件及各类绣衣、绣鞋、绣帽等，凡身上穿戴、床上辅盖、日常生活用的，大多施以刺绣装饰。从刺绣的靠垫、镜袱等精致绣品，也反映了当时生活的豪华奢侈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清代画家徐扬以《盛世滋生图》画出了苏州的盛况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苏州已被称为“绣市”（见《吴闾钱江会馆碑记》）。

正是由于苏州的盛而不衰，才使苏绣相应地如此兴盛发展。据彭泽益编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载，苏州绣庄“所出枕、被、门帘、床沿、桌披、椅披，销路之广，无远勿届；其他舞台戏装、神袍、画镜等物，年销亦颇可观。”1921—1926年苏州刺绣每年营业额达五十万元。1932年，“虽不如往昔之盛，但每年出品估值，尚有十余万元之谱。”

三、苏州的风俗人情与苏绣的广泛流传

苏州环境清静，湖山毓秀，人们性静而心细，安居而巧思，对于绘画绣花十分相宜。大家闺女在楼阁无事，就以刺绣消遣，绣嫁妆，绣礼品，女红刺绣成了女性的必修课，形成了“闺阁绣”。如《吴县志》记述：“城中妇女习刺绣，……刺绣工巧百出，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。”从宋刻《平江图》看，当时已有绣衣坊、绣锦坊座落在平江府衙的东侧、北侧，这是当时南北交通的主要街道之一，此外还有位于提刑司前的东西向街道衮绣坊，这些都成了绣工比较集中的坊巷。而郊外有“家家养蚕，户户刺绣”的传统，苏绣成了苏城内外一项群众性的家庭副业。据《中国实业志》载：“刺绣为苏州妇女之特长，民间妇女类能操是业，而尤以农民家庭为多，尤以浒墅关、木渎、光福及香山一带为尤甚，故与农村副业有关”。在苏州农村，地少人多，在无法扩大耕地面积和改进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情况下，农民为维持生存而要增加劳动收入，只能以农为主，兼搞副业。刺绣对于妇女最为轻松便利，老幼咸宜。她们利用农闲和晚上，一针一线就能赶着刺绣，一些空余的妇女劳动力还整天在家专业刺绣，以副养家。往往一家中母女、姑嫂对绷同绣。就这样世代承袭，相沿为习。

在广泛的民间绣基础上，明清以来苏州一些经营绸缎的商店便利用原料兼办发放绣品，或由中人联系，办起绣庄。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苏州刺绣业在香橙弄创立锦文公所时，捐资的有65户（《刺绣业创立锦文公所缘起碑》）。据1938年6月实业部月刊第一期中对苏州手工业的调查，原来出品绸缎绣件的绣庄有100余家。苏州盛办绣庄，对于苏绣生产的组织、销售、扩大宣传影响等方面起了一定促进作用。

在普及的基础上必然会有所提高。苏绣艺术家沈寿创办了刺绣学校，以后在苏州的一些女校中设立了刺绣课，这种风习培养一批批苏绣能手。解放后各种形式的刺绣教育仍不绝如缕，使苏绣技艺承上启下，苏绣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。现在除了有生产各类绣品的刺绣工厂，还设立较大规模的刺绣研究所。苏州所具的这些刺绣组织，都是苏绣技艺得以相传和提高的原因之一。

四、苏州的地方特产与苏绣的原辅材料

苏绣的原辅材料是丝绸针线，而这些正是苏州的特产。苏州是“丝绸之乡”，所产丝绸，色泽艳丽，平服光亮，轻软滑爽，还有纱、罗、绫、缎、布、纺、呢、绗等多种织物，在这些原料上苏绣都能因材施教。如著名的“吴绫”、“苏缎”，面料精致，闪闪发光，经过刺绣点缀，正如锦上添花；大同绸本身有二十多种提花，绣上图案后更是相得益彰。苏州利用地方特产原料发展副业，既无采购贩运之困难，又可随时染织，选配各色原料，使苏绣的生产大可作为。

刺绣必不可少的花线也产于苏州。花线的色彩优劣、质量好坏，关系着绣品成败的命运。苏州花线可染一百多种色彩，一种色彩可分二十多档色阶，都具“光、滑、细、柔”的特点，规格品种极多，可根据刺绣需要分别选用。如用于刺绣艺品和高档日用品的花线“加市掬”，可分擘成细若蚕丝的线绒，使绣出的绣品平薄匀贴，和色无痕，是苏绣所以能精美细致的主要物质条件。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苏绣的用针也是极佳的，据《吴县志》载，苏针“坚而不脆”，沈寿《雪宦绣谱》载，苏针“锋尖锐而鼻底钝，不伤手。”苏绣用的针纤细如毫，刺入吴绫，不留针迹。张小泉剪刀作坊所产刺绣专用的弯头绣花剪刀，口成弧形微弯上翘，可紧贴绣面齐根修剪线绒，使之不露线头，又不伤绣面。绣绷架由竹木材料制成，轻巧简易，采办这些材料在江南又十分便利。

苏州得地利而拥有以上“美材”。苏绣据此“美材”，在客观条件上可谓先天丰足。

五、苏州的地理交通与苏绣的博采众长

苏绣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，还占着地理交通的优势。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苏州地处锦绣江南，少经战乱，所受的破坏干扰也小。在一些王室避难南迁时，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随之南移；王室偏安江南，对这里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享受和需要，都客观上促进着苏绣的发展。清代康熙、乾隆的多次游苏，兴建行宫，布置陈设，预备礼品，提供玩赏，使苏州工艺美术品向着丰富多采发展和艺术之峰攀登。红木小件被称为“苏做”，玉雕匠还被征去京城为皇室操作。苏绣也在日用品和艺术品两个方面有所发展，无论山水、亭台、花鸟、人物等形象都能用各种针法表现出来，使之富有艺术感染力，以其精细的工艺美，博人喜爱，得到重视。明代正德年间昆曲兴起，苏州很快成为昆

曲的基地，同时成了刺绣剧装戏衣的良好处所。苏州刺绣的剧装戏衣至今还名列全国首位。

在当时以舟楫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的情况下，苏州系江南大运河的航运中心，四周湖荡浩繁，河道网络，交通便利，四通八达，成为贸易兴旺的城市。正如唐寅《阊门即事》中所述：“五更市贾何曾绝，四远方言总不同。”在这热闹非凡的吴中乐土，南来北往，互通有无，不但为苏州工艺品打开销路，而且也便于取他人之长，兼收并蓄。如近在上海的露香园顾绣对苏绣之影响，从刺绣的针法、色彩、技法上，不无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之功。因此当时苏绣业供奉的是顾名儒像，绣庄也冠以顾绣庄的牌号，甚至两大绣庄在群众中混淆起来，苏绣也被人称为顾绣。苏绣博采众长，精益求精，在同顾绣的竞争中不断前进，终于名列前茅，誉传四方。

六、苏州的姐妹艺术与苏绣的技艺风格

苏绣由苏州孕育培养而成，因此其艺术特色中带有浓郁的苏州地方气息。苏州的姐妹艺术对苏绣的技艺风格以一定的影响。

最初的苏绣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，后来在本地区的风俗人情和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下，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。苏绣的形成，首先与苏州的文化艺术分不开。苏州是文化古城，文人荟萃，世所闻名。苏绣受当时文人的影响，带有诗情画意的韵味。一些闺女小姐因新郎是文人雅士之属，所以手中的绣品也以风雅为上。富户人家的被面、帐沿、椅披等绣品，都反映了苏绣图形秀丽，色彩文雅，针刺细密，绣面整洁的传统特色。其题材、图案、色彩和艺术效果，也正是本地区人们所喜爱和倡导的。“绣绩共工”，绘画艺术对刺绣的影响更为直接。唐代释道盛行以来，刺绣佛像的也多，《应庵和尚话语录》中有“平江吉彬老侄女绣普贤像”的记录。宋代多山水花鸟画，宋绣也以山水花鸟为蓝本，如文震亨《长物志》述：“宋绣针线细密，设色精妙，光彩射目，山水分远近之趣，楼阁得深邃之体，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，花鸟极绰约嚬啼之态。”明代王鏊主编的《姑苏志》曾评说：“精细雅洁，称苏州绣。”表明当时苏绣已形成“精细雅洁”的艺术特色，也表达人们对此的赞赏和追求。清末书画家余觉为沈寿刺绣创作了许多精致的绣稿，“余则以笔代针，吾妻以针代笔，十年如一日，绣益精，名益噪。”（见余觉《痛史》）画家直接参与刺绣艺术的构思，沈寿又能将画理绣艺结合在一起，使苏绣发展到新的水平。

在苏州还有花线、金线、缂丝、宋锦、玉雕、木雕、灯彩等民间工艺。工艺美术在苏州形成专门行业。《吴县志》载，当时有绣作、银作、锡作、铜作、木作、漆作、玉工、骨角、装潢、捏像、扇、首饰等专业化的手工业铺坊。因此姐妹艺术互相借鉴，相互得益，这是胜过其他地区的。“吴中人才之盛，实甲天下。至于百工技术之巧，亦他处所不及。”（见道光《苏州府志》）苏州的各类手工艺，对于苏绣题材的选择，技艺的提高，出品的精致和品种的多样化，都起着促进作用。花线、金线直接为苏绣服务；装裱是艺术绣品成为册页、屏条必不可少的工艺；缂丝、宋锦对于苏绣的编绣、网绣、纱绣如同胞姐妹；苏扇的风行是苏绣扇袋的起因等等。苏绣的技艺风格的形成，也受到了苏州姐妹艺术的催化。

结 语

总而言之，苏绣是苏州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地方风物。它的发展变化是历代物质、经济、生产力、生活水平在苏州的反映。没有特定环境苏州，也就没有象现在的苏绣。同是刺

绣，河南开封汴绣在北宋曾显赫一时，《东京梦华录》称它“金碧相射，锦绣交辉”；上海露香园顾绣在明代曾“名震天下”，但后来由于所处产地条件的变换，或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濒临消亡，解放后在政府重视下才续弦新生。同是刺绣，由于苏绣汲取着苏州供给的丰富养料，扎根很深，枝繁叶茂。苏绣有自己的品种、题材、针法、技艺，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美。这种艺术美，也映出了苏州的一些风貌。产地与产物似有因果关系。

苏绣与苏州两者的关系，可以从更广的范围，从历史上的事物成长，来溯根究源，来解剖苏绣成因的过去，更好地认识苏绣，了解苏绣，找出规律，创造条件，更上一层楼。这对于其他民间工艺如何发扬地方特色，因势利导，扬长避短，创造其适合成长的条件，不无借鉴。

任何工艺美术品，都是一定条件的产物。不仅要适合工艺品纵向的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，还受到横向的各方面的影响。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贸易、地理、交通、自然、物产、风俗、人情等诸因素，都直接或间接地、程度不同地对工艺品带来影响。因此，要深入、全面地研究工艺品，不仅是一门纯艺术方面的学科，简直还是一门社会科学。工艺美术品往往兼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，人们通过一定的技艺手段，以现实生活的真，以艺术之美，来反映人民、民族新意的善，具体的将反映在作品的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上。因此，我们从工艺美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可以反复研究，从中找出社会科学和艺术世界的相互关联，总结出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些规律来。

我国擅长中国画，而西方流行油画；北京有景泰蓝，而无锡以泥人著称；盛唐有敦煌石窟，而宋代有精细瓷器；殷代张雉尾扇，汉唐盛绢宫扇，而宋明以来兴折扇。扇子又有苏扇、杭扇、歙扇、岳阳扇；刺绣列“四大绣”等等，由于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不同而不同。特定的条件产生特定的工艺品，良好的工艺品也需要相应的条件才能产生和得以成长发展，所以还得具体分析各个工艺品与产地的关系。

（上接第85页）

老。正因为这样，李存孝的传说强烈地感染他，竟使他不惜呕一番心血，把存孝移植到《英雄概》传奇中来。叶稚斐这种复杂心情，恐怕在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中还是有普遍意义的，显系包含着对现实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的清醒认识。我不同意某些人形而上学地评价古人，只看到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，而看不到他们在当时亦有想“上进”（姑且用此词）之心，更看不到他们内心交炽着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。叶稚斐是个诚实而不做伪的人，在《英雄概》中把自己复杂的心情，真实而巧妙地倾泻出来，对我们了解当时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有益的。

第四，在关目上分两条线交叉着对比着写：一条线写黄巢，另一条线写李存孝。他们都因愤慨于现实的不平而斗争，却走了不同的道路，先分开写，然后把两条线交织而拧成一条线，唱出对炎凉世态、险恶人生挣扎反抗和追求理想生活的歌。

叶稚斐是一位多才多艺，有真知卓见，勇于革新的剧作家。他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动荡、苦难、黑暗、恐怖的时代。他虽然在两种命运中痛苦地彷徨过，但终未屈服，在险恶的环境里，他既不阿权贵，亦不汲汲于功名，他自甘淡薄，宁冒风险，把自己一腔不平之气倾洒在文艺创作上，唱出了广大人民和下层知识分子复杂而又悲愤的哀歌。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人民和艺人中间，使他在思想、艺术上均能不为传统旧习所囿。他虽然常改编旧剧目，却不抱残守阙，拾人唾涕，而能不落常套，大胆革新。他的作品摆脱了明末文坛上浓重的脂粉气、道学气、书巾气，展现出复杂的社会生活，给传奇艺术形式开拓了新的视野。但叶稚斐毕竟是生活在十七世纪的文人，在他的作品中亦反映出一些旧的道德伦理观念，如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或鼓吹了愚忠、愚孝行为，赞同一夫多妻制，这显然是错误的，应予以批评。